

陶孟和与社会调查所

千家驹

社会调查所是旧中国的一个社会经济调查研究机构，它是与陶孟和先生的名字分不开的。陶孟和是我国五四运动时代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，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。在二十年代他与胡适之、陈独秀等齐名，是当时我国颇有影响的一位教育家、社会学家。解放以后，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，对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我曾经在陶先生领导下的社会调查所，做过四年的经济研究工作。我与陶先生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他的为人、作风，却给我以深刻的印象。

我是1932年秋季进入社会调查所工作的。1932年夏，我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。在北大读书期间，我经常写点文章在刊物上发表。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：《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》，文章大意是说，从海关报告上来看，抵制日货运动之次年或第三年，日货输华反而激增，这不能怪中国人民的五分钟热度，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民族工业不发达，结论是抵制日货不是根本办法，我们应该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才行。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个二、三流的刊物上，主办人是一个姓凌的小政客。有一次凌某去南京，恰好与胡适同一车厢。胡适无意中谈到我的文章，遂问凌某：“千家驹是谁的笔名？”凌说：“他是真姓名，他本姓千。”胡又问：“他在那儿工作？”凌说：“是他北大一个未毕业的学生。”胡听后，竟大为惊讶，说：“一个大学生有这样的水平，真不简单。我回北平后，一定要找他谈谈。”后来胡适回到北平，与吴晗说起此事，吴晗就说：“千家驹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中学时同学。”于是吴晗介绍我去见胡适。胡一见面，就问我

毕业后准备在那儿工作？我说还没有着落呢！胡就自告奋勇，介绍我去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。当时胡适在资产阶级学术界有很高的威望。胡一介绍，陶孟和便同意了。但以后陶一打听我是北大学生中的“捣乱分子”（九一八事变后，我参加了学生运动，曾任北大非常学生会主席），便踌躇起来了。他去问胡适：“听说千家驹是共产党，北大的捣乱分子，进调查所合适吗？”这一点，胡适倒比陶先生开明，胡适说：“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。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。而且进研究所，你怕他捣什么乱呢？再说，这样的人你不用，你还用什么人呢？”经胡适这么一说，陶孟和无话可说了。所以我的工作问题在北大未毕业就决定下来了。

我进入社会调查所，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态度的。但陶先生颇有蔡元培先生那种“兼容并蓄”的民主作风。他最讨厌的是国民党党棍子，这种人去他那里是吃不开的，而对于思想进步的青年，他虽不支持，倒可以优容。他指定我研究的题目是：中国的公债问题，先内债而后外债。陶先生是英国的老留学生，他颇有英国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种传统的民主作风。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。他信任每一个研究人员。他评判一个人研究成绩的好坏，是看他的研究成果，而不是他的政治立场。我研究公债问题，既没有导师指导，他也从不过问，而完全信任我能把工作做好。在半年之内，我就写了一个研究报告：《中国的内债》，经他审阅之后，就付印了。这本1933年出版的著作是我的处女作，现在北京图书馆还藏有这本书。

我对社会调查所最满意的是它没有签到制度。工作时间每天六小时，上午九至十二时，下午二至五时，礼拜六下午休息，所以每周工作时间仅33个小时。因为陶先生认为研究工作应以自愿为原则，只要他真对所研究的题目有兴趣，在工作时间以外，他自会日以继夜钻研的；反之，如对研究工作没有兴趣，整天坐办公桌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他不主张签到制度，请假也不用什么手续，只要对同房的同事说一声便行了。这一点陶先生与翁文灏先

生不同，翁文灏的地质调查所也是当时一个颇负盛名的研究机构，但翁先生是主张签到的，而且他自己也签到，总是在上班以前便到。所以我有几个北大同学在地质所做研究工作的，不得不一早便去，他们说不好意思签在翁先生的后面。但陶先生这种不签到的办法是成功的。我知道社会所许多同事，并不因不必签到而偷懒；反之，在工作时间之外，甚至礼拜天继续进行研究的颇不乏人，我自己便是这样一个。

1932年我进社会调查所后，随即与吴半农先生利用业余时间，翻译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和第二卷，这是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之约而翻译的。（译稿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已印成第一分册，因怕国民党当局干涉而未公开发行。该书现保存在中央马克思著作编译局资料室。）翻译《资本论》一事，虽主要决定于胡适，但陶先生亦是加以支持的。

陶先生与李四光先生是老朋友，他们都是早年英国的留学生，又是北大的老同事。李四光先生与李宗仁将军有友谊关系。当时新桂系李（宗仁）白（崇禧）黄（旭初）统一广西不久，他们提倡“三自”政策，（自卫、自治、自给），励精图治，网罗各方面人才，与南京政府唱对台戏。经李四光先生的介绍，社会调查所派吴半农、韩德章和我三人去广西调查经济（后又增加王子建）。我们于1933年7月初自北平出发，7月底抵达南宁。在广西经过了六个月的实地调查，于是年年底返回北平。我们将所调查的资料整理出来，写了一本《广西经济概况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在广西调查回来之后，我应上海《申报》馆之约，写了一篇《广西之行》在《申报》上连载。那知道这篇稿子刊登了两天之后，被陶先生看见了，他大发雷霆。他认为我未征得他的同意，就在报上发表文章，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举动。其实，我说他“大发雷霆”，未免言过其辞，因为他不过把我叫去，批评我不应未得机关同意就在《申报》上发表文章，并要我停止刊登。我答应立刻打电报给《申报》停止刊载，他就不再说什么了。当时我不

明白为什么陶先生对这件事那么认真，因为他素来是不干涉社会所同仁在外面发表文章的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当时广西正处于与南京政府相对抗的地位，他派我们去广西调查经济是不愿向外宣传的，怕因此引起南京蒋介石政府的误会。这是从政治上考虑，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，但他又不便明说，他见我同意停止发表，就不说什么了。

陶先生的伟大之处，就是他不因此而对我表示不信任或怀有偏见。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和以前一样。不久天津《益世报》老板来北平找陶先生，想在该报增加一个副刊，并物色一位主编副刊的人。天津《益世报》是一份天主教主办的报纸，在华北销路仅次于《大公报》。《大公报》与《益世报》都设在天津，双方竞争剧烈。当时《大公报》出了好几个副刊，深受读者欢迎。所以《益世报》主人来北平求教于陶孟和（陶为天津人，在天津文教界有崇高的地位）。陶先生就介绍我为《益世报》编一个副刊，名《农村周刊》，每星期六出版一期，每期占一版篇幅。我也不用去天津，只要把稿子编好，于每星期五下午五时以前快邮寄去，当晚天津即可收到，星期六一早可以见报。其实，社会调查所没有农业经济组，我又不是搞农业经济的，他介绍我去主编《农村周刊》可见他对我是不怀成见的。

1934年10月，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一个中国乡村建设工作讨论会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，即设在定县，参加讨论会的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、高践四的江苏教育学院等等单位。陶孟和先生就派巫宝三和我两人代表社会调查所去参加。回来之后，我写了一系列批判乡村建设运动的文章。我认为这些所谓“乡村建设”派是一种农村改良主义运动。它是为对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而产生的，“乡村建设”派不想触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，即推翻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。我的这一系列文章，有的发表在《益世报》的《农村周刊》上；有的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《中国农村》月刊上。陶先生是不会看不到这些文章的，但他从不对我加以干涉。

1935年，陶先生与胡适先生又介绍我去北京大学兼任经济系讲师，教的是“现代中国财政问题”。听说北大有一位教授对陶先生说：“千家驹懂得什么，他只知道帝国主义，封建主义。”但陶先生并不为所动，他还是支持我去教课。

陶先生对左派和进步言论很宽容。反之，他对国民党里盛行的吹拍作风则时时流露不满。有一次，他对我说：罗家伦初回国时（罗是陶先生的学生），去看他，大吹特吹，什么机关什么要人都要请他去帮忙。陶对他说：“志希（罗家伦的号），我看你最好当一名新闻记者。”罗听了后面红耳赤，因此对他恨之入骨。

1935年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，机关迁往南京，我亦随同机关于1936年1月去了南京。到南京后，我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，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南京救国会的活动。我整天在外奔走，很少去社会所上班。偶尔去上班，亦电话频繁，不能安心坐下做研究工作。但陶先生对我的行动从来没有加以干涉，也没有过问。他这种宽容的态度，实在令我感激。1936年11月，沈钧儒、邹韬奋、史良等“七君子”被捕后，我在南京呆不下去了，遂潜离南京，逃往广西，留了一封信给陶先生，正式辞职，听说他还表示惋惜之意。

抗战时期，我去桂林，社会科学研究所一度迁到阳朔，我曾经一度与陶先生在阳朔见面。后来社科院再迁到四川李庄，我们就没有机会见面了。直到解放以后，陶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，我于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，曾去陶先生寓所看过他几次，旧地重逢，倍感亲切。在1956年的学部大会上，我曾做过一次发言，发言的大意是说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，也应该批判地继承，不要全盘否定，不要苏联没有的学科，我们就一律取消。我说，至少像“国际公法”、“国际私法”、“比较宪法”这些学科，我们还要研究的。对社会学、心理学，也有可以借鉴之处。这个发言，陶先生非常欣赏，他在大会上曾向我示意，我的发言他全力支持。那知这个发言，在“左”

的思潮影响下，被认为是要搞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。当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，中国科学院党组认为我的发言是“右派”言论，一定要把我定为“右派”。后来由于我工作单位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）党组坚决不同意，因而作罢。但在批判所谓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”时，陶先生的一些言论也受到严厉的批判，听说他被周总理保护而幸免划为右派的。现在所谓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”已经中央正式平反，被错划为右派的曾昭抡、钱伟长、费孝通等同志也已得到改正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，也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态度，例如社会学、优生学，都恢复了名誉。陶先生逝世于六十年代，他在天之灵，如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我国学术界百家争鸣、欣欣向荣的局面，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。